

从经济到社会

——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迁:2003 - 2017

何晓斌 董寅茜

摘要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到2017年共10轮历时性横截面调查数据,考察了作为经济因素的收入和作为社会因素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两类社会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随着时间而增强。研究结论证实了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给予个体的安全感和稳定的未来预期的重要意义,在充满竞争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相比收入增加带来的短暂物质需求满足,个体更需要应对未来风险的信心、安全感和保障感。因此,政府应当增加社会性支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个体也应当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幸福感的提升。

关键词 市场; 社会; 城镇居民; 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1)03-0054-10

DOI: 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3.007

作者简介 何晓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导 北京 100084;董寅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 北京 100084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郑剑锋,2010)。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幸福感受到了高度关注,各国政府也纷纷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执政目标,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李克强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的国庆招待会发言中强调“人民幸福是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标尺”。因此,了解当前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十分必要,能够为提升幸福感提供政策参考。

幸福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Diener,1984):一是认为幸福感代表一种积极的

情绪,受个体精神气质、目标感等内在因素影响(Mccrae and Costa,1991;Wilson,1967)。二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制度和文化等宏观社会环境要素(Veenhoven,2005)和性别、年龄、婚姻等社会学因素。幸福感更是个体在客观环境中的主观感受,其本质是主体与现实达成平衡的状态(苗元江,2002)。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将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群体或社会标准对比后获得的更优越的认知是幸福感的来源(Michalos,1985)。总体而言,幸福感内涵丰富,影响因素多样,是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体互动的结果,本文将依循这一思路,考察社会变迁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变化过程。

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经济学以“效用”(utility)指代“幸福”,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使生产可能性

边界外移,带来更高效用,由此将其作为核心目标(罗楚亮,2009)。收入增加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能通过消费满足需求,而需要的满足是幸福感最基础的要素。除了消费的直接效应,收入还通过健康、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等因素间接影响个体幸福感(解垚,2009)。然而,Esterlin在1974年的跨国调查中否定了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判断,他发现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民幸福感不仅不会继续上升,甚至还有下降,即“伊斯特林悖论”(Esterlin,1974)。“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的影响更为关键,当收入高于周围群体或地区平均标准时,个体才会产生更强的幸福感(Duesenberry,1952)。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出口总额迅速增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收入增加进一步注入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201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超过8%,至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359元。高收入确实带来了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邢占军,2011),然而从历时性角度考察,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并未随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吴菲,2016)，“伊斯特林悖论”已初现端倪。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关系紧张、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等问题(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收入不再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人们的关注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安全感等非物质因素,而这些需要国家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保障。

与此对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逐渐向“构建和谐社会”转变,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中的重要一环,都表明国家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视。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同区域和群体间的社

会保障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来源,面对市场转型的不确定性,关注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亲友、邻里互助等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也具有重要作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支持从单位的正式保障发展到政府、社会和个体的社会网络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丘海雄等,1998),单位全权包揽的职能逐渐回归家庭或社区网络(丘海雄,1996)。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社会网络紧密相关,在支持主体、支持内容和方式上更灵活和多样化,是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更是“道德风尚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

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协调”理念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国家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收入关联国家经济,而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则是社会民生和公共事业的重要构成,考察这两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变化,是洞察改革以来总体社会变迁与人民心态变化的重要窗口,能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

基于此,本文将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至2017年的数据,考察这15年间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趋势。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收入这一经济要素以及与之相关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但是伊斯特林悖论已然说明,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民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这两类社会因素带来的安全感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二,许多研究分别探究了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支持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缺少对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进行比较,本文将在国家重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背景下,着重考察社会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第三,已有研究大都仅就某一年的截面数据展开研究,较少使用长期数据考察各项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有何变化,本文将采取动态时序的视角,探究收入和社会保障、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相对影响随时间演化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考察各年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次,比较每年两者显著性和系数的相对大小;再者,将收入与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历年的相对大小放到时间维度上考察其变化趋势。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主要围绕伊斯特林悖论展开,以我国国情为基础的文献可参考李路路和石磊(2017)的研究,本部分主要涉及社会因素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

(一) 社会保障和主观幸福感

社会保障首先是一项制度安排,是国家面向全体国民依法实施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各项保障措施的统称,承担着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利、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基本任务(郑功成,2008)。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医疗和养老是最主要的两项内容,对于个体有重要意义。

关于社会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从政策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政府改善民生的公共开支,认为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王延中等,2016)。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增强了个体的消费能力,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对于低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能改善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社会失衡状态(谢舜等,2012)。研究表明,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国民幸福感普遍更高(李晶,2012)。

对个体而言,社会保障不仅是一项制度,还能深入影响其行为和主观感受。在现代社会,个体面临一系列无法预料的负面事件如疾病、失业等风险,这将使原本稳定可预期的生活失衡(Vail,1999)。幸福感不仅代表个体对当前生活的感知,更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桑林,2018),而风险会带来不安全感 and 悲观的预期,从而损害主观幸福感。面对风险,人们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方式,例如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以预防经济不确定(Leland,1978)。

防范风险、追求安全感是人的本能需求,相比个体的预防措施,社会保障是一种更可靠的制度保障,例如Sjöberg(2010)发现失业保险能有效缓解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安全感。而健康风险和年老退休是个体生命中必然会面对的,相比外部的社会变迁更需要安全感和保障,社会保障能通过正式制度给予个体物质支持,医疗保险能分担疾病带来的医疗债务等经济风险,而养老保险则通过提前储存财富和退休后的固定收入缓解居民的不安全感,同时,国家提供的保障也能减弱个体的储蓄动机,有利于促进消费、提升社会经济活力。因此,社会保障作为制度性的风险预防措施能增强个体的安全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作用(桑林,2018)。

(二)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与社会保障相比,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种非正式的保障形式。社会支持的基础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社区和社交网络,涉及家庭成员、亲友、邻居等有密切来往的个体(周林刚和冯建华,2005)。Langford(1997)认为社会支持在内容上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或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支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基于社会关系的支持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学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有充分的探讨。一方面,个体和家人、亲友或邻居的来往化解了孤独感(辛自强和池丽萍,2001),个体感受到自己身处集体、受到关心爱护,需要对集体履行义务,同时享有权利(Cobb,1976)。这种归属感和信任感是一种社会整合的方式,能促进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当面临突如其来的生活压力时,个体有信心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帮助和支持(Karademas,2006),而这种乐观的期待有助于提升当前的幸福感。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提供的情感、物质或信息等支持增强了个体应对压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Cheung,1997),例如通过亲友借款化解疾病带来的财务危机,年老时获得家人照料等。由此,社会支持能够抵御个体面对的健康风险和退休收入减少的困境,缓解生活失衡的紧张预期,这种保障感和安全感对于增强幸福感有重要意义。

本文根据社会支持主体,将其划分为家庭支

持、亲友支持和邻里支持三类。家庭成员的支持是一种切实的情感照顾,亲友支持是家庭外的圈子,个体能从中获得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邻里支持基于地理的邻近性,是个体从所处的社区组织中获得的安全感来源。

(三)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变化: 从经济到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在此期间,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依靠行政指令调控,统一分配的生活必需品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物资匮乏是常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的分配方式,大大激发了经济活力,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回报上升(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现代企业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以绩效和奖金为导向的工资制提升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个体通过知识和能力获得较高报酬,城镇居民的支配收入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商品的自由流通使人们有了更多选择,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欲望获得了满足。改革的经济福利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物质富足增强了个体的幸福感。

然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生存需要获得满足之后,人们倾向于追求安全感、归属感和自尊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其中,安全感仅次于生存需要,安全意味着消除恐慌和焦虑,对稳定、秩序的确信和被保护的感觉(Maslow,1943)。市场转型固然增加了个体收入、满足了消费需求,当前物质欲望的满足也构成幸福感最基本的来源,然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也使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逐渐上升。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全然不同,自由市场允许每个个体进入,然而创业率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大批企业因竞争失利而面临亏损和债务被挤出市场。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岗失业的风险增加,灵活的收入分配方式固然能促进个体的积极性,但基本工资水平的降低扩大了企业内部职工的收入差距,加剧了收入的不确定性。人们面临市场竞争带来的压力,当前工作获得的高收入无法保证未来生活无忧,随时都会面临企业倒闭或被裁员的风险,收入带来的福利增加和消费欲望满足

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对未来安全和稳定的需求才是个体的心理基石。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风险预期更是现有的物质富足无法解决的。健康危机是每个个体都可能面对的风险,外部社会环境带来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也导致患病概率大大上升,年老退休则是一种必然的未来预期,意味着收入锐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下降,需要他人的照料支持。人们希望维持当前的收入水平和相对稳定的物质生活状态,如何保障这一状态的延续、抵御这些风险成为个体的重要考虑(乐章,2005)。幸福感不仅是当前欲望的满足,更是未来的稳定预期,很难想象一个无法应对未来风险的个体会感到幸福。因此,个体倾向于寻求安全感这一心理需求的满足。

安全感的实现依托于一系列社会因素的支持。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的生活受到单位的全方位庇护,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事项都由所在单位负责,这一时期整体的社会环境也偏于稳定,人们的风险意识较弱(袁志刚和宋铮,1999)。改革以来,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反而出现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现象,人们通过储蓄保障未来生活、防范经济风险,“预防性储蓄动机”恰恰表明个体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迫切需求(陈刚和李树,2012)。社会保障的福利功能从单位转移到社会(李汉林和渠敬东,2002),由政府、单位和个体等多主体共同承担,然而相比市场环境中脆弱的个体,国家制度和社会关系的保障更为有效。2010年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社会保险法》的通过标志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有了法律保证,此后,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参与行为会大大减弱通过储蓄预防风险的倾向,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能帮助人们应对健康危机带来的收入冲击,维持年老退休后生活水平的稳定,为个体提供了底线意义的保障,促使人们将财富投入当前的消费(Hubbard等,1995)。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提供的另一种形式的稳定预期构成了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单位制的瓦解迫使个体从对企业单位的全面依赖中剥离,回归私人关系和家庭,兼具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单位也将子女

教育、赡养老人等责任交由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承担(丘海雄等,1998),基于个体关系网络的社会支持对于企业统筹的福利安排的替代功能逐渐凸显,面对市场经济和个体生活经历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的风险,个体需要从这些社会关系中得到保护和支持从而获得安全感和信心。

总体而言,市场化确实带来了财富增长,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但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生命历程面临的风险,收入增长的富足感逐渐为寻求安全感所替代,而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通过制度和非制度的方式满足了个体对安全和稳定性的需求。据此,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相对于收入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随时间不断增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随时间减弱。

假设 2: 社会保障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增强。

假设 3: 社会支持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增强。

假设 4: 社会保障相对于收入对提升主观幸

福感的重要性随时间不断增强。

假设 5: 社会支持相对于收入对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随时间不断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变量与模型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03年到2017年共10轮数据^①。选取该数据的原因有:第一,各年问卷均包含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第二,调查的时间跨度长、覆盖大多数省份,适合全面考察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考虑到社会保障主体从单位到政府,本文选取当前居住在城镇、有工作的个体,共有27582个信息完整的从事非农工作的城镇居民构成分析样本。

变量测量方式见表1。

本文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分别以收入和社会保障、收入和三类社会支持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将计算各个模型中变量的标准化系数(Beta值),以使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可比性。

表1 变量操作化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 1 (比较) 不幸福 = 2, 一般/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3 (比较) 幸福 = 4, 非常幸福 = 5 ^②
自变量	收入	上一年总收入,在后续分析中取对数
	医疗保险	有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 = 1, 无上述医疗保险 = 0 ^③
	养老保险	有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 1, 无上述养老保险 = 0
	家庭人口	由被访者填写家庭人口数
	亲友交往 ^④	2003、2005和2013年“您和亲人、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密切 = 1, 不密切 = 2, 一般 = 3, 密切 = 4, 非常密切 = 5)
	邻里交往	2005和2015年“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非常不熟悉 = 1, 不太熟悉 = 2, 一般 = 3, 比较熟悉 = 4, 非常熟悉 = 5)
控制变量	邻里互助	2005年“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没有 = 1, 偶尔有 = 2, 有时有 = 3, 较多 = 4, 很多 = 5), 2010年“在我需要时邻居愿意帮助我”(完全不同意 = 1, 不同意 = 2,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 3, 同意 = 4, 完全同意 = 5)和2012年“当我有需要时,邻居们都乐意帮忙”(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为1到7) ^⑤
	性别	男性 = 1, 女性 = 0
	年龄	调查年份减受访者的出生年份
	婚姻状况	已婚 = 1, 未婚或离婚 = 0
	教育程度	文盲 = 1, 小学 = 2, 初中 = 3, 高中/技校/中专 = 4, 大专 = 5, 大学本科 = 6, 研究生及以上 = 7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1, 非党员 = 0
	户籍	城镇户口 = 1, 农业户口 = 0, 其他 = 2
	房产	有自己的房产 = 1, 无自有房产 = 0
	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 1, 私有/民营企业 = 2, 其他 = 0
省份	采访地点,设为一系列虚拟变量	

(二) 描述性统计

表 2 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而言,城镇劳动力的主观幸福感呈上升趋势,但在 2010 年前上升速度较快,2010 年后则有轻微波动(见图 1)。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我国居民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 13006.99 元到 2017 年的 74501.89 元,

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一致(见图 2)。图 1 和图 2 间接证明了“伊斯特林悖论”中经济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我国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参与比例总体呈升高趋势,且在 2012 年后保持稳定上升(见图 3),这与国家从经济建设到和谐社会的政策转型有一定关联,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发展。

表 2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年份	全样本 N = 27582	2003 N = 2222	2005 N = 2772	2006 N = 2728	2008 N = 1781	2010 N = 3184	2011 N = 1547	2012 N = 3439	2013 N = 3328	2015 N = 2918	2017 N = 3663
幸福感	3.75 (0.79)	3.37 (0.73)	3.52 (0.74)	3.51 (0.71)	3.87 (0.87)	3.84 (0.80)	3.93 (0.80)	3.85 (0.79)	3.77 (0.78)	3.89 (0.77)	3.89 (0.77)
收入(对数)	9.73 (2.09)	8.93 (1.87)	9.33 (1.16)	9.18 (1.93)	9.23 (2.72)	9.66 (2.05)	9.63 (2.09)	10.02 (1.61)	10.16 (1.70)	10.05 (2.56)	10.34 (2.44)
医疗保险	0.77 (0.42)	0.73 (0.45)	0.57 (0.50)	0.50 (0.50)	0.67 (0.47)	0.85 (0.36)	0.67 (0.47)	0.87 (0.33)	0.87 (0.34)	0.90 (0.30)	0.92 (0.27)
养老保险	0.65 (0.48)	0.69 (0.46)	0.53 (0.50)	0.46 (0.50)	0.65 (0.48)	0.60 (0.49)		0.70 (0.46)	0.71 (0.45)	0.71 (0.45)	0.75 (0.43)
家庭人口	3.03 (1.46)	3.35 (1.11)	3.39 (1.33)	2.81 (1.13)	2.95 (1.18)	2.91 (1.29)	3.17 (1.46)	3.00 (1.22)	3.04 (1.20)	2.91 (1.59)	2.91 (2.24)
亲友交往	3.57 (0.77)	3.57 (0.57)	3.64 (0.73)						3.52 (0.79)		
邻里交往	3.29 (1.02)		3.36 (0.96)							3.22 (1.06)	
邻里互助			2.63 (1.05)			3.75 (0.86)		3.94 (0.84)			

注: (1) 养老保险、亲友交往、邻里交往和邻里互助变量仅涉及部分年份数据,对应样本量分别为 26035、8317、5688 和 5535; (2) 括号外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3) 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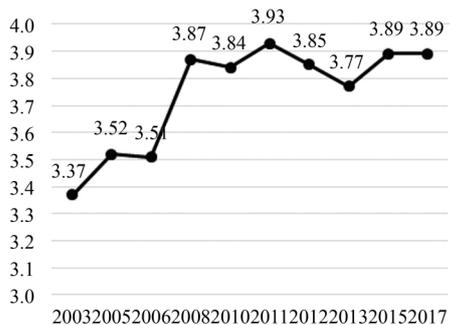


图 1 2003 - 2017 年中国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变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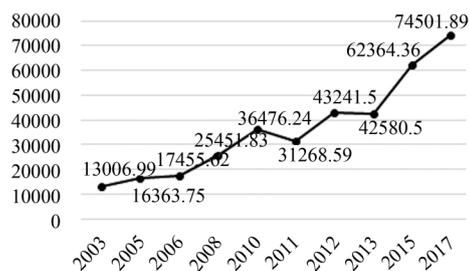


图 2 2003 - 2017 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变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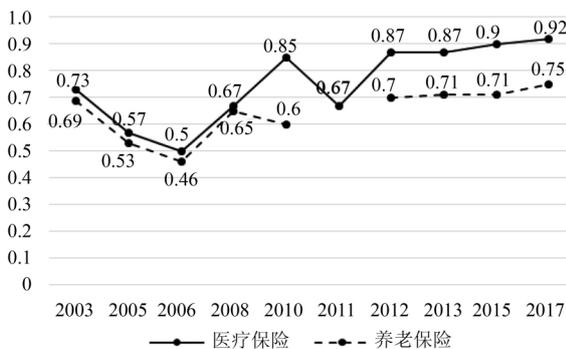


图 3 2003 - 2017 年中国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参与率变化折线图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 收入、社会保障与主观幸福感

表 3 呈现了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1 表明,收入和社会保障对主观幸福感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医疗保险的影响程度大于收入。从各年份的结果上看,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系数和显著性上有逐渐减小的趋势,假设 1 得到证实。这印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伊斯特林悖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所减弱。在社会

保障上,医疗保险在2010年后对于主观幸福感有稳定的正向显著作用,这与我国在2010年后发展重心从经济转向和谐社会有一定关联,养老保险由于医疗保险的共线性作用^⑥,仅在2003年呈现显著,但基本为正向影响^⑦,这也表明医疗相对于养老对幸福感的作用更紧迫和重要,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社会保障对于个体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且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存在

差异。

进一步比较收入和社会保障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在2012年前,收入的系数基本大于社会保障,而在2012年后,医疗保险的系数超过收入,假设4基本得到验证。这表明社会保障对于提升幸福感的作用相对于收入随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增强。

表3 收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主观幸福感

变量/年份	全样本 模型1	2003 模型2	2005 模型3	2006 模型4	2008 模型5	2010 模型6	2012 模型7	2013 模型8	2015 模型9	2017 模型10
收入(取对数)	0.075*** (0.002)	0.111*** (0.008)	0.117*** (0.013)	0.083*** (0.007)	0.061*** (0.007)	0.056*** (0.007)	0.070*** (0.009)	0.045** (0.008)	0.029 (0.006)	0.020 (0.005)
医疗保险	0.104*** (0.014)	0.036 (0.046)	0.086*** (0.047)	0.032 (0.048)	0.054 (0.081)	0.063*** (0.041)	0.040** (0.044)	0.074*** (0.044)	0.072*** (0.052)	0.036** (0.050)
养老保险	0.016** (0.013)	0.070*** (0.043)	0.009 (0.044)	0.023 (0.048)	-0.045 (0.079)	0.033 (0.034)	0.012 (0.035)	0.028 (0.035)	0.004 (0.035)	0.027 (0.03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26035	2222	2772	2728	1781	3184	3439	3328	2918	3663
R ²	0.101	0.139	0.127	0.138	0.126	0.125	0.089	0.086	0.107	0.106

注:(1)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系数和显著性,下文表格同;(2)变量系数均为标准化后的结果,下文表格同;(3)2011年未涉及养老保险相关问题,故此表格仅呈现9轮调查结果;(4)*、**、***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收入、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

表4报告了收入和家庭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结果。在2008年及以前,家庭人口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而2008年后家庭支持的影响变得显著,且逐渐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超过收入,这表明家庭支持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收入的作用相对减弱。

表5呈现了亲友支持和邻里支持的结果。从2003年和2005年到2013年,亲友交往的影响程度均大于收入,且相对于收入的系数显著增大,这

表明亲友支持对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性随时间增强。邻里交往相对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从2005年到2015年有显著增加,邻里互助这一变量在2005年不显著,而在2010年和2012年呈现显著且标准化系数大于收入。由此,邻里互助对于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性相对于收入不断增强。

综上,假设3和假设5得到验证。社会支持对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且相对于收入,其带来的安全感和稳定的未来预期的重要性随时间增强。

表4 收入、家庭支持和主观幸福感

变量/年份	全样本 模型1	2003 模型2	2005 模型3	2006 模型4	2008 模型5	2010 模型6	2011 模型7	2012 模型8	2013 模型9	2015 模型10	2017 模型11
收入(对数)	0.083*** (0.002)	0.122*** (0.008)	0.124*** (0.013)	0.087*** (0.007)	0.063*** (0.007)	0.058*** (0.007)	0.015 (0.010)	0.071*** (0.009)	0.049*** (0.008)	0.032* (0.006)	0.025 (0.005)
家庭人口数	0.022*** (0.003)	0.022 (0.014)	0.004 (0.011)	0.028 (0.012)	-0.013 (0.019)	0.042** (0.011)	0.060** (0.015)	0.043** (0.012)	0.041** (0.012)	0.059*** (0.009)	0.030*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27582	2222	2772	2728	1781	3184	1547	3439	3328	2918	3663
R ²	0.087	0.132	0.123	0.137	0.125	0.121	0.081	0.088	0.080	0.105	0.10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5 收入、亲友支持、邻里支持和主观幸福感

变量/年份	2003 模型 1	2005 模型 2	2013 模型 3	2005 模型 4	2015 模型 5	2005 模型 6	2010 模型 7	2012 模型 8
收入(对数)	0.112*** (0.008)	0.121*** (0.012)	0.044** (0.008)	0.127*** (0.013)	0.036* (0.006)	0.125*** (0.013)	0.092 (0.016)	0.057*** (0.013)
亲人交往	0.216*** (0.019)	0.182*** (0.018)	0.185*** (0.017)					
邻里交往				0.068*** (0.015)	0.080*** (0.014)			
邻里互助						0.028 (0.013)	0.130*** (0.029)	0.101*** (0.0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样本量	2219	2772	3326	2772	2916	2772	1039	1724
R ²	0.175	0.154	0.111	0.127	0.107	0.123	0.176	0.10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⑧。

(1) 用线性回归模型对 CGSS 加权后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与未纳入权数的基本一致。

(2) 由于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有五个级别, 本文采取有序 Logistic 模型进行检验, 并通过 KHB 方法使各年模型获得的系数具有可比性(吴菲, 2016)。结果与线性回归基本一致, 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随时间减弱, 而社会因素对提升幸福感的意义相对收入增强。

(3) 本文通过拟合优度变化比较了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在模型中分别依次加入三个自变量, 比较拟合优度的增量。结果表明, 社会保障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解释程度较强, 社会支持相对社会保障对模型拟合优度提升的贡献在 2012 年后明显增加。这表明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需要在经济因素之外重视社会因素。

五、总结和讨论

在市场转型深入发展, 对人民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对 CGSS 2003 年至 2017 年 10 个调查年份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主要获得了以下发现: 首先, 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其次, 收入这一经济要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随时间相对减弱, 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这两个

社会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随时间相对增强, 在当前对提升幸福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通过对社会因素的关注, 拓宽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解。经济因素始终受到高度关注, 并被证明与个体幸福感紧密相关, 物质富足意味着个体能够自由选择和消费, 满足其欲望和需求, 因此, 不论对于一个国家、地区还是对个体而言, 经济发展、收入提升和财富累积是提升幸福感的必由之路。而本文则证明了作为社会因素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能够增强个体的安全感, 对于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幸福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 应当从心理感知的角度去理解, 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构成了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方面。更重要的是, 幸福不仅意味着当前的享受和需求满足, 更在于个体对于整个生命历程的思考和关注, 未来遇到健康危机时能否顺利化解, 年老退休收入锐减时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并在有需要时获得生活群体的帮助支持, 长远的稳定生活预期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

第二, 本文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通过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的变化趋势发现, 收入相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随着时间减小, 这间接地证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在逐渐接近“伊斯特林悖论”的 U 型曲线拐点, 物质财富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逐渐下

降,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我国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过渡,从总体性控制到市场自由买卖,经济活力被激发的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大量不确定性也涌入人们的生活,相比单位制庇护下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对于安全感和未来保障的需求大大提升,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第三,本文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和佐证。市场化提高了居民收入,促进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然而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公共支出的比重远低于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支出(陈刚和李树,2012),社会民生发展相对滞后,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民众的保障感并没有提升。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会损害民众切身利益,带来不安全感;对国家而言,人们倾向于采取高储蓄低消费进行自我保障也抑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平衡经济和社会事业支出,增加公共项目支出,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减轻民众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社会支持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在一个道德秩序良好、社会关系融洽的社会中,个体才能感受到归属感,在遇到困难时获得帮助,因此政府需要从宏观层面倡导道德风尚、增强人际信任,构建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的和谐社会,才能切实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注:

- ①10 轮数据涉及年份为 2003、2005、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 年和 2017 年;其中 2003 年数据只覆盖城镇居民。
- ②2008 年前问卷询问“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怎么样”,2010 年及以后问卷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2008 年问卷询问“您觉得您快不快乐”,本文参考过往文献将快乐视为对幸福感的测量。
- ③2008 年及以前问卷询问所在单位或公司是否提供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2008 年后问卷询问目前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和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 ④限于问卷,邻里支持和亲友支持的数据仅包含部分年份,但

时间跨度近十年且包含 2010 年这一政策转折点。

- ⑤邻里互助七级量表折算为五级量表。
- ⑥虽然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间存在较强的共线性,但将两个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可以起到相互控制的作用。仅放入养老保险时其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大部分年份显著。
- ⑦2008 年系数的异常结果可能与该年对幸福感的测量方式与其他年份不一致有关。
- ⑧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稳健性检验表格,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参考文献:

- (1)边燕杰、张展新《市场化与收入分配》,《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
- (2)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 年第 8 期。
- (3)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11 年第 8 期。
- (4)李汉林、渠敬东《制度规范行为——关于单位的研究与思考》,《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
- (5)李晶《社会保障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重庆与世界》(学术版)2012 年第 8 期。
- (6)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
- (7)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2009 年第 11 期。
- (8)苗元江《幸福感,社会心理的“晴雨表”》,《社会》2002 年第 8 期。
- (9)丘海雄《国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改革与工人的理性选择》,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6 年。
- (10)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
- (11)桑林《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8 年第 6 期。
- (12)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 年第 2 期。
- (13)王菲《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社会》2016 年第 4 期。
- (14)解歪《与收入相关的健康及医疗服务利用不平等研究》,《经济研究》2009 年第 2 期。
- (15)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社会》2012 年第 6 期。
- (16)辛自强、池丽萍《快乐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心理学报》2001 年第 5 期。
- (17)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 (18)袁志刚、宋铮《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 年第 11 期。
- (19)乐章《农民的疾病风险与医疗保障:一个实证分析》,《经

- 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 (20) 郑功成 《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走向国家—社会保障制——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变迁》，《社会保障研究》2008年第2期。
- (21) 郑建峰 《边沁思想的再讨论》，《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
- (22) 周林刚、冯建华 《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 (23) Cheung C. K. , World understanding and well - being in a Hong Kong Chinese marital context ,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 1997 , 158(1) : 41 - 58.
- (24) Cobb S. ,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 1976 , 38: 300 - 314.
- (25) Diener E. D. , Subjective well - being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84 , 95(3) : 542 - 575.
- (26) Duesenberry J. S. , *Income ,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ur*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1952: 1 - 12.
- (27) Easterlin R. A. ,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 *Nations &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 1974: 89 - 125.
- (28) Hubbard R. G. , Skinner J. S. , Zeldes S. P. ,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Social Insuranc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95 , 103(2) : 360 - 399.
- (29) Karademas E. C. , Self - efficacy , social support and well - 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optimism ,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 2006 , 40(6) : 1281 - 1290.
- (30) Langford C. P. H. , Bowsher J. , Maloney J. P. , et al. , 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alysis ,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 1997 , 25(1) : 95 - 100.
- (31) Leland H. E. ,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 *Elsevier* , 1978: 127 - 139.
- (32) Maslow A. H. ,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 *Psychological Review* , 1943 , 50(4) : 370 - 396.
- (33) McCrae R. R. , Costa P. T. , Adding Liebe und Arbeit: The Full Five - Factor Model and Well - Being ,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1991 , 17(2) : 227 - 232.
- (34) Michalos A. C. , Multiple discrepancies theory (MDT)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1985 , 16(4) : 347 - 413.
- (35) Sjöberg O. , Social insurance as a collective resource: unemployment benefits , job insecurity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Social Forces* , 2010 , 88(3) : 1281 - 1304.
- (36) Vail J. , *Insecure times: living with in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 Routledge , 1999: 1 - 22.
- (37) Veenhoven R. , Apparent quality - of - life in nations: How long and happy people live , *Quality - of - life research in Chinese , Western and Global Contexts*. Springer , 2005: 61 - 86.
- (38) Wilson W. R. ,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67 , 67(4) : 294.

(责任编辑:秦 川)

From Economic to Social Factors: The Chang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 - being: 2003 - 2017

He Xiaobin & Dong Yinxi

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 this paper uses 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 data of CGSS from 2003 to 2017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support on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was found that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one's subjective well-being ,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two social factors strengthens over time compared to economic factors. This research support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support to give individuals sense of security and stable future expectation. In a market full of competence and uncertainty , individuals need more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to avoid future risks than temporary satisfaction of material needs from income. Therefore ,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social expenditure and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dividuals also need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 to increase happiness.

Key words: market; society; urban; people; subjective well-being